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重新檢視瓦特的聯盟理論

An Reappraisal of Walt's Theory of Alliances

doi:10.30390/ISC.201409_53(3).0004

問題與研究, 53(3), 2014

Issues & Studies, 53(3), 2014

作者/Author：陳麒安(Chi-An Chen)

頁數/Page：87-115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4/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1409_53\(3\).0004](http://dx.doi.org/10.30390/ISC.201409_53(3).000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重新檢視瓦特的聯盟理論

陳 麒 安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摘 要

國際關係學者瓦特 (Stephen M. Walt) 曾提出以「威脅平衡」概念為主的聯盟理論，挑戰了現實主義內部關於「權力平衡」的論點，後來又有學者提出「利益平衡」與「推卸責任」的論述加以反駁。經由本文的探討與重新檢視，這些學者爭論的焦點在於「制衡」與「扈從」概念上的界定。由於學界對於「扈從」在理論解釋與個案運用上的解讀不同，其實際上涵蓋了積極扈從（順從）與消極扈從（屈從）兩種相反的概念，吾人若僅從「制衡」與「扈從」兩種分類便欲判斷何者在國際關係中較為盛行，則易因立場不同而產生不必要的歧異。

整體而言，瓦特的聯盟理論觀點吸納了其他學派的論述，因而增強了理論的解釋能力。但瓦特對若干詞彙與概念的模糊界定，並忽略了國家之間為了戰略利益而積極合作形成聯盟的可能性，確實也減損了其理論的完善。

關鍵詞：權力平衡、威脅平衡、扈從利益、推卸責任

* * *

壹、前 言

現實主義可說是國際關係中最古老也最主要的理論典範，尤其是在安全事務領域中。^①然而，現實主義也是國際關係理論在過去 50 年中，受到最多挑戰與關注的理論學派之一，而其內部也存在著許多爭論。^②即便華爾滋 (Kenneth N. Waltz) 曾經表

註① 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Autumn 1999), p. 5.

註② 關於現實主義內部的爭論，可參見：Stephen G. Brooks, "Dueling Realism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No. 3 (Summer 1997), pp. 445~477；Michael E. Brown, Owen R. Cote Jr.,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Offense, Defense and War*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4)；王元綱，「樂觀的現實主義：國際關係守勢現實主義之評析」，*國際關係學報*，第 18 期（2003 年），頁 41~57；包宗和，「現實主義之自我論辯及其與批判理論間之解構與建構」，*國際關係學報*，第 18 期（2003 年），頁 1~21；鄭端耀，「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爭辯之評析」，*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2 期（民國 92 年 4 月），頁 1~21。

示，如果國際政治有什麼獨特的政治理論，那就是「權力平衡理論」。^③這樣的觀點也受到了其他學者的挑戰，其中最有力的觀點即為瓦特（Stephen M. Walt）所提出的「威脅平衡理論」。^④事實上，若吾人進一步探討瓦特所提出的聯盟理論，則可發現其對於聯盟形成提出的可能因素實際上包括：一、對於威脅的回應——制衡或扈從（bandwagoning）；二、意識形態；三、外交援助；四、跨國滲透等。其中又以共同制衡威脅為國家締結聯盟關係的主要因素。然而，瓦特的觀點亦不完善，受到不少批評，本文便希冀能梳理不同學者的論點，再針對這些爭論深入探討比較，特別是有關「制衡」與「扈從」概念的歧異。

筆者初步認為，國際關係中的扈從實際上涵蓋了積極扈從（順從）與消極扈從（屈從）兩種相反的概念，但卻未被明確區隔，使得學者在運用理論解釋個案時，出現不必要的誤會。本文主要研究目的即釐清這些學者彼此爭論的焦點與依據為何，並簡述學界近來對於制衡與扈從的研究成果，以便對於國家在互動關係中的不同戰略與行為模式考量提出更為妥適的解釋。

本文首先將簡介瓦特對於聯盟的界定及其聯盟理論架構，其次則是針對學者們的不同批評，試圖在參考瓦特相關著作而不違背其基本論點的前提下予以回應，^⑤再次是釐清學者之間對於「扈從」概念的歧異與不同的「制衡」方式，進而推論出國家在國際關係中可能採取的行為模式，最後則是結論與研究不足之處。

貳、聯盟的概念

國際關係學界對於聯盟的定義莫衷一是，對於聯盟之間是否一定要簽訂白紙黑字的盟約以劃分權利與義務也未具有共識。^⑥僅以學者瓦特本身而言，其對於聯盟的定義

註③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 Co., 1979), p. 117.

註④ 在瓦特的相關著作中，所強調的概念為「威脅平衡」。惟筆者於文中，有時為在符合中文語意的情況下，強調國家面對威脅的反應是制衡而非扈從，將混合使用「威脅制衡/制衡威脅」的詞彙，但皆表達相同概念。

註⑤ 瓦特近年來仍屢發表新作，基本上仍維持「威脅平衡」的主張，但鮮少直接回應其他學者的批判。參見：Stephen M. Walt, "Keeping the World Off-Balance: Self-restraint and U.S. Foreign Policy," in G. 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21~154; Stephen M. Walt, *Taming American Power: The Global Response to U.S. Primacy* (New York: Norton, 2005); Stephen M. Walt, "Alliances in a Unipolar World,"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January 2009), pp. 86~120.

註⑥ 有關聯盟定義上的差異，可參見：Glenn H. Snyder,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4, No. 1 (Spring 1990), pp. 103~106. 有關聯盟理論發展的綜合回顧文獻可參見：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87), chs. 1-2; Stefan Bergsmann, "The Concept of Military Alliance," in Erich Reiter and Heinz Gärtner, eds., *Small States and Alliances* (New York: Physica-Verlag, 2001), pp. 25~37; John P. Miglietta, *American Alliance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1945~1992: Iran, Israel, and Saudi Arabia*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2), ch. 1; Nasuh Uslu, *The Turkish-American Relationship Between 1947 and 2003: The History of a Distinctive Alliance* (New York: Nova Science, 2003), ch. 2; Cindy R. Jebb, *Bridging the Gap: Ethnicity, Legitimacy, and State Align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4), pp. 273~306; Alexandra Gheciu, *NATO in the "New Europe":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After the Cold Wa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ch. 6.

也並非前後一致。

在 1987 年的著作中，瓦特指出「聯盟是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之間的正式與非正式安全合作關係。其假定了成員之間有不同等級的承諾與利益交換，而破壞這樣的關係會有所損失。」^⑦不論是制衡或扈從，都可以從國家是要聯盟以對抗或與主要的外在威脅合作的基礎上來加以辨別。^⑧在此觀點中，聯盟的定義涵蓋了與威脅來源結盟。

後來瓦特表示，防禦性的聯盟通常是為了對付特定的威脅或突發狀況。^⑨若干年後則又補充解釋：「聯盟（或聯合）是兩個以上的國家之間正式（或非正式）的安全合作承諾，意圖要增強每個成員的權力、安全和（或）影響力。雖然在不同聯盟內部所呈現的精確安排差異甚大，但在一個有意義的聯盟中，最主要的本質即為互相支持以對抗外部行為者的承諾。因為這些承諾會影響到國家領導者可以期待憑靠的能力，以及其必須準備面對的對手。」^⑩此時，聯盟已成為國家之間對付外部行為者的合作方式。

在是否需要正式條約方面，瓦特認為聯盟（alliance）與聯合（alignment）是相同的概念。由於許多國家不願意與盟友簽署正式的條約，如果只將分析局限於正式的聯盟關係，便會忽略許多重要的案例，而精確的區分則有可能導致曲解而非凸顯個案。例如，美國與以色列之間並未簽訂正式聯盟條約，但沒有人會質疑這兩個國家之間的承諾程度。因此，對聯盟承諾加以嚴格區分很容易誤入歧途，因為正式和非正式安排的實際意義很可能會隨著案例而不同。^⑪

因此，吾人可根據瓦特較新的定義而把聯盟視為：一、國家之間的安全合作關係，包含正式和非正式的聯繫安排，聯盟條約的締結並不是必要條件。二、參與國在這種合作關係當中，相互提供承諾並產生影響。三、國家共同合作的目的是要對付團體的外部行為者，為了調解、避免、防止成員內部衝突的集體安全制度並不包含在內。換言之，前述觀點也排除了（敵對）國家之間一般的安全合作關係，如：裁減軍備、防止大規模毀滅武器擴散等。

註⑦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pp. 1, 12.

註⑧ Ibid., p. 17.

註⑨ Stephen M. Walt, "Collective Security and Revolutionary Change: Promoting Peace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 George W. Downs, ed., *Collective Security Beyond the Cold War*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p. 169.

註⑩ Stephen M. Walt, "Alliances in a Unipolar World," p. 86. 粗體字為筆者為強調所加。

註⑪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p. 12. 另一位研究「聯盟理論」的學者則主張應對於聯盟的定義予以嚴格區別，參見：Glenn H. Snyder,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 pp. 103-106. 瓦特認為，不採用嚴格的分類法並不是指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聯盟之間沒有區別，也不是指對聯盟的分類不可能。對「聯盟」在分類與定義上的探討，可參見：Bruce M. Russett, "An Empirical Typology of International Military Alliances,"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5, No. 2 (May 1971), pp. 262-289; Stefan Bergsmann, "The Concept of Military Alliance," pp. 25-37.

參、瓦特的聯盟理論架構

瓦特在《聯盟的起源》一書中，提出了四項可能形塑聯盟的假設，並一一提出理論分析與個案支持展開論述。這些假設包括：

一、由於國家無法將生存的希望寄託在他國的善意之上，因而往往會傾向於對抗威脅的來源，亦即制衡威脅而非扈從它，且加入了較弱的那一方還能對聯盟關係發揮影響力。¹²瓦特認為，國家最主要是依照其他國家的「意圖」而非「能力大小」來判斷是否具有威脅性，才決定應該要聯盟合作亦或是加以對抗。因此，當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相繼爆發時，美國後來加入的，都是整體實力較強但對其沒有威脅的那一方。¹³

至於在判斷國家是否具有威脅性方面，則可以從四項條件來加以判斷，包括：（一）整體實力－實力越強的國家，越能夠對他國造成威脅，但此般權力不但能痛擊對手，也能用以保護盟國，不能過於武斷認定；（二）地理鄰近性－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距離較近的國家能投射的權力會超過較遠的國家；（三）攻擊能力－國家的整體實力有可能轉化成攻擊或防禦的能力，端賴何者比較有利，但當國家將其鄰國的實力視為攻擊性時，就會感受到威脅；（四）侵略的意圖－被認為具有侵略性的國家有可能刺激其他國家形成制衡它的聯盟，即便該國實際能力尚不足以威脅他國。這種「意圖」上的判斷對於聯盟的選擇來說，扮演了關鍵的角色。當面臨到一個具有強大侵略性的國家時，選擇扈從還不如加以對抗，或許還有一線生機。¹⁴

瓦特認為，如果制衡成為國際關係的趨勢，便會使得國家不敢採取過於強勢的政策，因為這樣會引起其他國家結盟對抗。而扈從威脅或強權意味著將本國的安全寄託在其他國家的善意之上，更何況這個具有侵略性的國家將會因為盟國的加入而增加了更多可用的資源。¹⁵即便如此，在某些狀況下，國家也會選擇扈從威脅。當弱小的國家對制衡威脅的陣營來說發揮不了作用，加入該陣營卻反倒可能在與威脅對抗的過程中招致損失，還不如扈從威脅來源，至少在與另一陣營對抗時，能受到盟國的保護；或者當未能獲得盟國協助，而無法形成有效制衡的陣營時，國家會傾向於扈從威脅；最後則是當國家在和平時期或戰爭剛爆發時，往往會選擇制衡威脅，但當情勢明朗時，

註¹²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pp. 18~19. ; 另可參見：Kenneth N. Waltz,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126~127. 但華爾茲強調，當一方聯盟勝過另一方聯盟，勝利聯盟中的弱國將會任憑強國擺佈，所以才要採取權力平衡政策，因為威脅該國安全的，是較強的一方，而若另一方有足夠的防禦與嚇阻能力時，該國的加入則能得到更多的尊重與安全。但其目的是追求權力的平衡而不是國家權力最大化，不希望單一國家過於強大，主要仍然是「權力平衡」而非「威脅平衡」的概念。

註¹³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p. 22.

註¹⁴ *Ibid.*, pp. 22~26.

註¹⁵ *Ibid.*, pp. 28~29.

有些國家會見風轉舵，靠向較有勝算的那一方。^⑯

二、在意識形態形塑聯盟方面，瓦特提出幾種解釋，包括：相似的國家會聯合捍衛共同的政治價值觀，所以彼此較不擔心會發生戰爭；與相似的國家結盟可以讓不穩的國內政權取得在國際社會的正當性；意識形態本身的訴求即可解釋聯盟的行為等。^⑰但除非國家都處於相當安全的環境，他們才會遵循意識形態偏好，否則還是會以威脅是否存在作為衡量聯盟形成的主要標準。^⑱然而，即便意識形態相同的國家之間亦會發生齟齬。當意識形態作為政權正當性的來源，而又需要一個領導代表時，盟國之間便會爭奪這樣的地位；或是由於占領導地位的國家可以對聯盟的意識形態擁有較高的詮釋能力，盟國之間的紛爭便由此而生。^⑲

三、提供經濟或軍事援助也能促使聯盟的出現，因為受贈的一方將會變得依賴援助國，而援助越多，聯盟關係也會越緊密。但提供與接受援助剛好是實力不對等的國家間為了對付共同威脅而採取的措施，因此對外援助與其說是聯盟的起因，還不如說是聯盟的結果。^⑳此外，瓦特還強調，當援助國提供的物資越有價值，對於此物資寡占的程度越高，該項援助作為型塑聯盟的工具也會越有效。因為在其他選擇不存在的情況下，受贈國為了取得援助，將會盡可能地順從援助國的偏好。但重點在於受贈國與援助國之間必須是前者依賴後者，那麼這種不對稱的依賴才得以發揮槓桿影響力。當受贈國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而援助國又極度需要該國時，援助國所能發揮的影響力則會減弱。^㉑

四、在跨國滲透方面，國家可以透過忠誠分裂的政府官員、遊說團體和國外宣傳等方式去影響目標國政治菁英與民意的發展變化，轉而有助於形成聯盟。但瓦特強調，目標國必須是個開放的社會而易於接受宣傳，且採取滲透的國家必須目的正當而手段合法，否則可能會出現反效果而激發目標國的敵意。^㉒

簡單地說，瓦特聯盟理論的主軸在於：一、國家之間形成聯盟的可能因素包括：對威脅的反應（制衡或扈從）、意識形態、對外援助、跨國滲透等，其中又以制衡威脅

註⑯ Ibid., pp. 29~31.

註⑰ Ibid., pp. 34~35.

註⑱ Ibid., p. 38.

註⑲ Ibid., pp. 35~37.

註⑳ Ibid., pp. 41~42. 雖然瓦特在書中是以蘇聯對古巴和尼加拉瓜提供武器援助為例，指出美國官員相當關切蘇聯欲將中美洲「東歐化」。但事實上，美國的對外援助政策也相當代表了其欲對受贈國家發揮政策影響力的作法。參見：Brian Lai and Daniel S. Morey, "Impact of Regime Type on the Influence of U.S. Foreign Ai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2, Issue 4 (October 2006), pp. 385~404; "The Role of Foreign Aid in Development," *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http://www.cbo.gov/sites/default/files/cbofiles/ftpdocs/0xx/doc8/foraid.pdf>>. 瀏覽日期：March 20, 2013。

註㉑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pp. 43~44.

註㉒ Ibid., pp. 46~48. 關於運用利益團體遊說而影響目標國的外交、聯盟政策，可另參見：John J. Mearsheimer and Stephen M. Walt, *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7).

為主要因素。二、當國家面臨威脅時，大多選擇制衡而非扈從。三、當國家選擇制衡策略時，應是制衡威脅（威脅平衡），而非制衡權力（權力平衡）。瓦特並不認為國家強大的權力就一定會招致制衡，主要還是應以威脅性作為判斷的標準，而意識形態在促進聯盟形成的效果，可能還是弱於國家針對威脅予以制衡的考量。對外援助與跨國政治滲透則不易單獨成為形塑聯盟的有力因素。

肆、對瓦特聯盟理論的批評與回應

瓦特對於聯盟理論與國際關係現實主義學派最大的貢獻，便是區隔了權力與威脅感的差異。華爾滋原先指出，國家為了追求安全，在國際社會中一旦落後，他們會更加努力強化自己的實力，或是選擇與其他國家合作。^②在無政府狀態下，安全是國家的最高目標，如果國家追求的是權力最大化，就會加入實力較強的陣營，權力平衡就不會出現，而只會出現世界霸權。世界霸權沒有出現的緣故，是因為制衡而不是扈從強權，才是國際體系引發的行為。國家最關注的不是權力最大化，而是維持自己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如果他們加入的聯盟陣營有足夠的防禦和嚇阻能力來抵擋對手陣營攻勢，他們將會得到更多的尊重和安全。^③對於次級的國家來說，如果可以自由選擇的話，他們會靠向較弱的陣營，因為較強的陣營會威脅他們。^④就有學者曾批評華爾滋的觀點模糊，認為其理論強調的是能力，但在應用上卻凸顯了外部威脅的角色，^⑤這樣子實際上混淆了權力與威脅感兩種概念。對於國家來說，他國強大的權力一方面可能是威脅的來源，但另一方面卻也可能是安全的保障，可以促進或維繫長期的合作。否則吾人就無法解釋諸如美國與英國之間的長期聯盟特殊關係。^⑥

然而，瓦特的觀點也引起若干迴響。^⑦基歐漢曾評論指出，瓦特對於聯盟的研究系承襲於華爾滋新現實主義而來，而新現實主義最大的缺陷便是忽略了「國際制度」

註②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18.

註③ Ibid., pp. 125~126.

註④ Ibid., p. 127.

註⑤ Robert O. Keohane, "Alliances, Threats, and the Use of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3, No. 1 (Summer 1988), p. 171.

註⑥ 有關美國與英國之間的特殊關係，參見：Paul D. Miller, "Five Pillars of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Survival*, Vol. 54, No. 5 (October-November, 2012), p. 19；James Wither, "An Endangered Partnership: The Anglo-American Defence Relationship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European Security*, Vol. 15, No. 1 (March 2006), pp. 47~65。及該文注釋①的書目。

註⑦ 其他學者也曾經對瓦特在《聯盟的起源》一書中的觀點加以評論，可另參見：Michael N. Barnett, "Identity and Alliances in the Middle East,"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400~447；James H. Lebovic, "Unity in Action: Explaining Alignment Behavior in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1, No. 2 (March 2004), pp. 167~189；楊仕樂，「重建威脅理論與台灣大陸政策的案例研究 1993-2005」，*亞太研究通訊*，第7期（2009年），頁103~128。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的重要性。²⁹其更認為，聯盟就是國際制度，不論是持久的程度還是力量，都部分地取決於聯盟的制度特徵。³⁰建構主義學者溫特 (Alexander Wendt) 則引述瓦特的觀點，認為威脅感正是受社會建構的。³¹

由於國際關係理論各學派對於聯盟理論皆有不少研究成果，惟為聚焦研析學者觀點的差異，本文將著重探討現實主義陣營內部的不同意見。首先，筆者將探討施韋勒 (Randall L. Schweller) 的見解，因其曾直接針對瓦特觀點提出批判。³²其次，米爾斯海默 (John J. Mearsheimer) 雖未直接反駁瓦特的論述，但由於其曾明白指出，受威脅的大國偏好推卸責任而不是制衡，³³與瓦特的觀點明顯不同，因此有討論之必要。

一、利益平衡／扈從利益

學者施韋勒將國家偏好此一變項納入一國聯盟政策的考慮中，並反駁指出具有維持現狀偏好的國家才會選擇制衡對手，以免破壞了現狀所能帶來的利益。但是對於試圖改變現狀的國家 (revisionist) 來說，正是由於對現狀不滿，因此選擇扈從 (或接受扈從) 才能聚集更大的權力以獲取衝突後的利益。此外，施韋勒一方面批評新現實主義具有「維持現狀」的偏見，³⁴另一方面還認為瓦特將「扈從」定義為「與危險一方結盟或屈服於威脅」(aligning with the source of danger or giving in to threats) 與一般的用法出現落差，因為其本意是指「追隨潮流、流行趨勢或加入有可能獲勝的一方」，意味著積極追求利益而非消極避免風險。³⁵對於想要改變現狀的國家來說，追隨另一個崛起的改變現狀強權並與其締結聯盟只會威脅到那些試圖維持現狀國家的利益，對自己並不會構成威脅，因此提出了「利益平衡」(balance of interest) 或「扈從利益」(bandwagoning for profit) 的觀點，說明國家往往是考慮利害關係後選擇了扈從強權來獲取和確保利益。³⁶

施韋勒對聯盟理論研究的主要貢獻在於，提出國家實力與傾向的不同組合，因而可以衍生出四種類型的國家，包括：實力強大且想維持現狀的獅子，採取制衡或推卸

註²⁹ Robert O. Keohane, "Alliances, Threats, and the Use of Neorealism," p. 174.

註³⁰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p. 15.

註³¹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Spring 1992), pp. 396~397;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06.

註³² 參見：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p. 72~107. 由於施韋勒於該文中直接針對瓦特的觀點提出批判，筆者在本文中將主要針對此文章探討施韋勒的論點。

註³³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pp. 139~140.

註³⁴ Randall L.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3 (Spring 1996), p. 90.

註³⁵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p. 81.

註³⁶ 另可參見：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2 (Fall 2004), pp. 159~201.

責任；實力不足但想維持現狀的綿羊，採取姑息（appeasement）、靠向主流的扈從（wave-of-the-future bandwagoning）、旁觀遠離（distancing）；實力強大且想改變現狀的豺狼，採取冒險的侵略（risk-acceptant aggression）；實力不足但想改變現狀的胡狼，採取扈從以瓜分利益（jackal bandwagoning）。³⁷實際上，若考慮到國家相對實力差距與對外政策傾向，當本國與弱國或強國的傾向相同時，便會出現可以合作的契機，強國將接受弱國的扈從，不論是一起維持現狀或改變現狀。然而，當本國與弱國或強國的傾向不同時，便會彼此視為威脅而可能引發相互攻擊制衡。國家之間可能出現的互動關係如下表 1 所示，只有若干組合才符合施韋勒所謂積極合作或扈從的情形。

表 1 國家相對實力差距與政策傾向對國際互動關係之影響

相對實力	國家傾向	本國	
		維持現狀	不滿現狀
強國	維持現狀	扈從加入 ³⁸	受到制衡或被迫扈從
	不滿現狀	受到制衡挑釁	扈從以制衡其他強國 ³⁹
弱國	維持現狀	接受扈從合作	制衡或強迫弱國扈從 ⁴⁰
	不滿現狀	制衡或強迫接受扈從	接受扈從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網底區塊才是國家之間的積極合作關係。

此外，施韋勒認為，胡狼型國家不滿現狀，但又不像改變現狀的大國敢於冒險投機。這種國家會追尋改變現狀的豺狼型國家，也會在戰爭幾近勝利時，追尋維持現狀的獅子型國家。兩種扈從都是掠奪性的推卸責任，試圖搭上其他國家攻擊行為的順風車（to ride free on the offensive efforts of others）。⁴¹然而，若胡狼型國家仍維持原本傾向，但係在基於生存或利益考量而選擇扈從對象時，扈從抱持相同傾向的豺狼型大國便是「積極扈從」，扈從原本抱持相反傾向的獅子型大國則是「被迫扈從」，後者即為瓦特被施韋勒批判的論點；若吾人主張國家可忽略自身傾向而僅透過盱衡情勢來決定外交政策作為，則施韋勒將國家傾向引入國際關係理論／聯盟理論的創見反倒失去了價值，其學術貢獻與立論基礎反倒被自己推翻。

施韋勒指出瓦特的「扈從」概念有若干缺點：（一）偏離傳統用法。由於「扈從」的本意是指「追隨潮流、流行趨勢或加入有可能獲勝的一方」，意味著積極追求利益而非消極屈從。但包括瓦特在內，也有其他學者將「扈從」視為向威脅妥協屈服。筆者認為，當這些觀點將「扈從」視為面對威脅的制衡反應之反義詞時，確實會忽略國家之間還存在可以積極分享利益的情況。施韋勒便曾以法國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和德國希特勒（Adolf Hitler）為例，說明當國家聚集強大的軍事力量時，

註³⁷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pp. 100-104.

註³⁸ 施韋勒表示，「感到滿足的國家會加入維持現狀聯盟，即便其為較強的一邊」（Satisfied powers will join the status-quo coalition, even when it is the stronger side.）。Ibid., p. 88.

註³⁹ 義大利莫索里尼扈從到德國希特勒那邊，兩國都是不滿現狀的國家。參見：Ibid., p. 87.

註⁴⁰ 試圖維持現狀的弱國還可能採取遠離威脅的措施，以免被捲入戰爭。參見：Ibid., pp. 102-103.

註⁴¹ Ibid., p. 103.

有時會吸引其他國家扈從過來尋求利益或保護。^⑫（二）**案例選擇偏差**。只考慮有重大外部威脅的情況，因而僅提供國家回應外部威脅的理論而不是聯盟理論。^⑬（三）**具有維持現狀的偏見**。感到滿意的國家會加入維持現狀的聯盟，即便是較強的一邊；但不滿現狀的國家將受到利益而非安全的驅使，會扈從到崛起的改變現狀國家。^⑭

針對瓦特的第一項缺點，施韋勒在討論法國拿破崙的案例時，曾表示這些中型的日爾曼國家受到誇大承諾的誘惑，自願地向拿破崙扈從靠攏（voluntarily climbed aboard Napoleon's bandwagon）。^⑮但有學者表示，靠向改變現狀大國的國家，往往是在形勢比人強的處境下被迫加入。這正好符合瓦特對於「扈從」概念的界定，在拿破崙領導下的法國更是試圖改變現狀的大國。其他學者們即便在研究法國拿破崙的案例中使用「扈從」一詞時，也出現概念運用不同的情況。例如，施若德（Paul Schroeder）認為，當法國在軍事權力和動員資源上的創新在 1793 年的戰場上展現出來時，其他國家就紛紛選擇扈從法國或避免衝突。^⑯另一位學者則認為，正是法國佔領了低地國和萊茵區，擊敗了奧國與普魯士，才使得第一次反法聯盟瓦解。之後，西班牙面臨的選擇不是扈從，而是「加入或滅亡」（join or die），這其實不是選擇，而是屈服於霸權強制作為的舉動。^⑰這種國家被迫做出選擇的情形，剛好是瓦特定義中的「扈從」，即與威脅來源妥協結盟。原本施韋勒提出的「扈從」，是加入即將獲勝的那方，所以並不會有畏懼害怕的感受，反而想藉此獲取部分利益，因此可被視為「偃大邊／見風轉舵／靠攏」（bandwagoning for profit）以分一杯羹。但在瓦特的觀念中，則是將扈從視為國家面對威脅的無奈反應，本身即已建立在被迫選擇的前提之下，因為該國的實力不足以與敵國對抗，勉強與威脅來源為伍，或許能苟且生存。學者們對於施韋勒所提出的法國拿破崙案例之理解角度並不一致。

針對第二點，筆者認為，施韋勒忽略了制衡和扈從只是瓦特提出的聯盟理論架構中，國家面對威脅的兩種回應而已，其他形成聯盟的因素還包括意識形態、對外援助與跨國滲透，但這些因素僅扮演輔助或次要的角色。此外，關於國家行為的動機方面，施韋勒還批評指出，威脅制衡理論只能被用來考慮以安全為聯盟目標的案例，而排除了受到利益驅使的情形。^⑱事實上，瓦特確實忽略了國家之間可能因具有共同的戰略利益，雙方都是出於自願合作以在戰後分享勝利成果而形成聯盟的動機。^⑲但一方面，生存與安全正是國家最高的利益，當國家為了生存與安全而選擇制衡或扈從對手時，也應可被視為受到利益的驅使，瓦特的觀點並未排除此般看法。另一方面，若施

註^⑫ Ibid., p. 80, 82, 85.

註^⑬ Ibid., p. 83.

註^⑭ Ibid., p. 88.

註^⑮ Ibid., p. 90.

註^⑯ Paul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Oxford: Clarendon, 1994), p. 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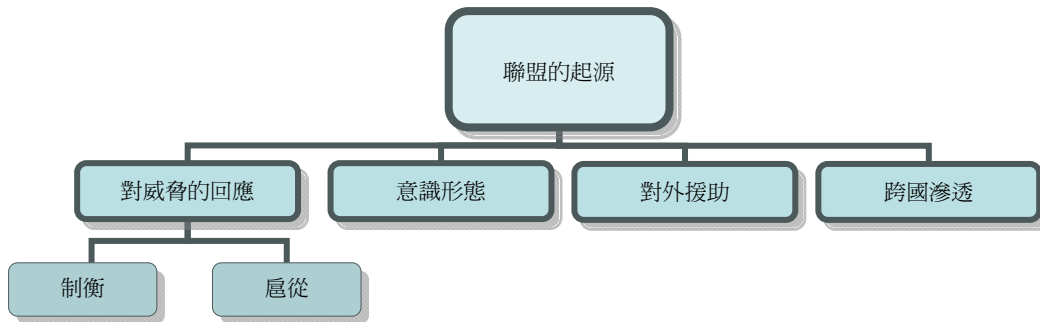
註^⑰ Daniel J. Whitehead, "Long-Term Bandwagoning and Short-Term Balancing: The Lessons of Coalition Behaviour from 1792 to 1815,"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No. 2 (2001), p. 157.

註^⑱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p. 79.

註^⑲ 感謝審查委員提供的寶貴建議。此即施韋勒所提出的「積極扈從」。

韋勒指的是單純的經濟利益，此即瓦特所謂以對外援助形成聯盟而對抗第三國的情形。施韋勒忽略了瓦特的威脅制衡理論只是其整體的聯盟理論架構（如下圖 1 所示）當中的一個分支，因而瓦特不僅提出了國家回應外部威脅的理論，還有關於聯盟起源的理論。

圖 1 瓦特的聯盟理論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雖然施韋勒曾表示，「當國際政治中都是尋求安全最大化的國家時，這些國家為何會感受到威脅？他們又為何會採取制衡？」意味著國家的目標並不相同，國際政治中還是存在試圖改變現狀的國家。^⑩然而，國家追求安全最大化的目標並不表示其將一直維持現狀不變，更有可能會因為擊敗或削弱鄰國可以獲得更大的安全感——當然也包括權力與利益——或是出於其他誤判的因素而促使國家發動戰爭。^⑪由於國際體系處於無政府狀態，沒有中央權威可以維持秩序或制止對外擴張而訴求改變現狀的國家，各國之間會出現相互防範對抗的情勢，因而仍然可能引發戰爭。即便在國際體系當中，這種試圖改變現狀的國家極為少數，但由於沒有國家能精準預測是哪一個？故仍會隨時提防警戒，必要時再予以制衡。

二、推卸責任

另一位現實主義學者米爾斯海默認為進攻性現實主義和人性現實主義都將大國描繪成殘酷無情的權力追逐者，而正是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使得大國盡可能地擴展相對權力，因為這是獲得安全的最佳途徑。^⑫其進一步指出，大國存在於一個充滿競爭的世界中，彼此都視為潛在的競爭者，因而會希望透過犧牲對手來獲得權力。世界上的大國之間雖然也存在合作關係，因為權力平衡的邏輯常常會促使大國形成聯盟，一起反對共同的對手，但合作的程度並不可能完全減少安全競爭的主導邏輯。^⑬由於大國總

註⑩ Randall L.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pp. 91-92.

註⑪ 特別可參見守勢現實主義學者的著作：Stephen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註⑫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p. 21-22.

註⑬ Ibid., pp. 51-53.

是在尋找機會獲取超出對手的權力，最終目標是獲得霸權，體系中到處是心懷改變現狀傾向的大國。因此，米爾斯海默認為，推卸責任是受到威脅的大國要制衡時的主要選擇，他們試圖讓別的國家來承擔阻止或對抗侵略者的責任。推卸責任的國家充分認知到要防止侵略者增加獲得世界權力的需求，但設法讓其他受到威脅的國家來執行這項任務。^④換言之，米爾斯海默提出的推卸責任策略仍贊成國家採取制衡，但要設法讓其他國家來承擔責任、進行制衡。

相較於瓦特認為國家之間為了制衡其他國家而合作，便形成了聯盟關係之觀點，米爾斯海默則表示國際合作更為困難。其指出，國家的行為主要是受到了計較相對權力的動機所驅使，並不是為了要建造出獨立於國家自身利益以外的世界秩序，才願意做出承諾。一般來說，特定國際秩序的出現往往是大國在國際體系中，採取自利行為的副產品。^⑤由於大國非常重視權力平衡，當他們考慮與其他國家合作時，會重視相對收益而不是絕對利益，如此一來，國家之間的合作就變得更困難。對欺騙行為的擔憂顧慮也會影響合作，大國會擔心其他國家透過欺騙行為而享有優勢。只要國際體系仍處於無政府狀態，就不可能出現真正的和平，國家總是追求權力。^⑥然而，若由此邏輯推論，當聯盟或國際組織中的每個國家都採取追求相對收益的動機時，那麼只會有一個國家有可能獲得比其他國家更多的利益與權力，自然無法吸引其他國家參與合作。但以國際關係的實際發展看來，仍有許多聯盟和國際組織歷經了長期的發展而持續運作，並未因為參與者所得的收益較其他國家少，便排斥加入。由此可見，米爾斯海默的論點並不周全，而前述觀點卻也存在幾項不足之處。

（一）將權力與威脅等化

由於進攻性現實主義學者認為，國家權力越大，越會對外採取侵略行為，以獲得更大的權力。在這樣的概念中，權力越大的國家就意味著越具有威脅性。相較於瓦特將權力、威脅感受與侵略意圖等因素加以區分所提出的「威脅平衡」觀點，前者反而容易造成案例描述上的偏差。若干國家權力強盛，固然會引起其他國家或聯盟的敵意，但也可能提供盟國信任感與安全保護。

（二）將推卸責任與制衡模糊化

米爾斯海默主張，制衡和推卸責任是大國用來阻止侵略者破壞權力平衡的主要策略。透過制衡，受威脅的國家要認真參與圍堵危險的對手。透過推卸責任，他們會設法讓其他大國制止侵略者，但自己冷眼旁觀。在真實世界中，國家實際的選擇是制衡和推卸責任，而只要可能的話，受威脅的國家會偏好推卸責任而不是制衡。^⑦受威脅的國家可透過 4 種不同的方式來採取推卸責任戰略：1. 對侵略國發展友好關係，或者至

註④ Ibid., pp. 29, 157~1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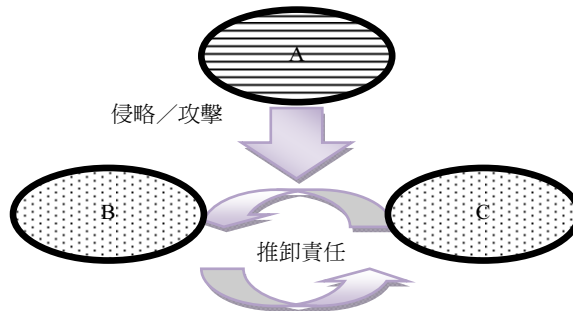
註⑤ Ibid., p. 49.

註⑥ Ibid., pp. 52~53.

註⑦ Ibid., pp. 139~140.

少不要刻意刺激它；2. 與預計的責任承擔者保持冷淡關係，避免被連累捲入戰爭；3. 動員本國的額外資源，建立強大的防禦能力，讓侵略者不敢進攻；4. 鼓勵預期的責任承擔者擴增力量，以便擁有更好的能力與機會嚇阻侵略國。^⑤

圖 2 國家推卸責任策略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在上圖 2 中，當 A 國試圖侵略 B、C 等鄰國時，對於 B、C 兩國來說，若欲將制衡 A 國的責任推卸給對方，便是採取推卸責任策略。然而，若依照米爾斯海默提出的作法，第 1 項措施幾與瓦特的「扈從」觀點無異，都是與威脅來源國交好。施韋勒也曾指出，當國家的目標是要轉移敵方的攻擊時，扈從和推卸責任是很難區分的。^⑥第 2 項措施則需有國家願意承擔責任，否則恐將無法有效制止或滿足侵略者的擴張行為。第 3、4 項則是 B、C 兩國之一（不論是推卸責任者或承擔責任者）提升自我實力的「內部制衡」行為。如此一來，在推卸責任者、承擔責任者與侵略者之間可能會衍生出軍備競賽或安全困境的態勢，反倒又回到了「權力平衡」或「威脅平衡」的邏輯。米爾斯海默也指出，當侵略者出現時，最後至少會有一個國家承擔責任來制止它，制衡幾乎總是會發生，雖然未必會成功。推卸責任的邏輯在於，哪個國家做出制衡而不是制衡是否會成功的問題。推卸責任者只是想要讓其他國家承擔責任，不過還是希望威脅能夠被制止。^⑦因此，米爾斯海默所指稱的「推卸責任」其實意味著由其他國家來採取行動，本質上仍然是進行「制衡」。事實上，這樣的觀點只是將國家制衡對手的歷程延展，凸顯正式展開制衡之前的空窗等待期，但實際上又允許國家在必要的時候參與制衡。^⑧華爾滋早先便對於以「國家是否會參與制衡」來證偽權力平衡理論時指出，應該要以每 15 年作為一個時間間隔，來檢驗各國的外交與政策是否得以解釋和預測國家的反應，如此才能瞭解此般延遲是否與（權力平衡）理論不符。^⑨換言之，華爾滋對

註 ⑤ Ibid., pp. 157~159.

註 ⑥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p. 82.

註 ⑦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 269.

註 ⑧ 可另參見：Norrin M. Ripsman and Jack S. Levy, "Wishful Thinking or Buying Time? The Logic of British Appeasement in the 1930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3, No. 2 (Fall 2008), pp. 148~181.

註 ⑨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25.

於國家爲了採取制衡措施而締結聯盟的期程亦持較爲寬鬆的態度，吾人似不應以國家沒有「立刻」採取制衡措施來論定該國採取了推卸責任戰略。米爾斯海默的立論一方面試圖同時涵蓋了不制衡（推卸責任）與制衡兩種策略，差別僅在於國家準備期程長短的不同，另一方面對於國家採取制衡之動機理解又與瓦特的觀點十分相近，差異性似乎僅在於：1.誰來制衡？2.何時制衡？恐不足以作爲瓦特「威脅平衡」觀點的替代選項。

（三）邏輯推論不合理

如前圖 2 所示，對於 B、C 兩國來說，最佳的策略當然是將制衡 A 國的責任推卸給對方，並趁 A 國因與另一國纏鬥而國力受損時，再趁隙介入擊敗 A 國或與 A 國征戰的國家，以坐收漁翁之利。但實際上，B、C 兩國都不會願意獨力承擔制衡的責任，可能共同合作對抗 A 國，抑或因不願合作而被 A 國各個擊敗。由於米爾斯海默認爲，國家生存在一個缺乏中央權威的國際體系當中，每個國家都具有攻擊性的軍事能力，而且永遠無法確認其他國家的意圖，因而使得追求安全的國家彼此採取侵略行爲。^③然而，依此觀點，既然國家關切的是自身安全，依賴聯盟夥伴合作制衡對手以保護本國固然不可靠，但已經受到威脅還「期待」其他國家來承擔制衡的責任，而不採取自立自強措施則又顯得不切實際。因此，瓦特便會表示，對於威脅的潛在制衡者會彼此推卸責任，希望他們的盟國能首先阻止、圍堵或擊敗侵略者。可是如果他們過份地想推卸責任或搭便車（free-ride），那麼制衡的聯盟便無法獲得足以打敗對手的力量，甚至會因爲彼此互相猜疑而導致瓦解。^④從進攻性現實主義學者對於人性與國家企圖極度不信任的邏輯看來，筆者認爲，不容易出現「適度地」推卸責任而獲致成功的可能，當各國都欲推卸責任時，更鮮有國家會願意主動承擔單邊制衡的重任。在此前提之下，各國都會過度推卸責任，設若沒有其他國家願意承擔制衡的任務，最終恐將都遭侵略者一一擊敗。如此一來，推卸責任便不易成爲一項受多數國家採用的選項。

由於米爾斯海默認爲，大國總是在尋找機會獲得超越對手的權力，以獲得霸權地位爲最終目標。除非存在獲得絕對優勢的特殊國家，否則前述目標將不允許維持現狀國家的存在，在體系中反而充斥著懷有改變現狀企圖的強權。^⑤因此，若依照前述邏輯，每個大國一方面想要爭取霸權，另一方面都在面對其他國家的崛起時試圖推卸責任而非制衡，則這些國家追求霸權的過程應會相當順利而不會遭致抵抗，歐亞大陸理應早已出現霸權國家。但米爾斯海默卻又曾表示，國家追求霸權的目標很少能實現，受到威脅的國家會有強烈的動機聯合起來反對有強烈欲望的霸權。^⑥事實上，正是因爲國家之間相互制衡，使得歐洲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長期時間，經常性地形成

註 ③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 3.

註 ④ Stephen M. Walt, "Keeping the World Off-Balance: Self-restraint and U.S. Foreign Policy," in G. 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p. 140.

註 ⑤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 29.

註 ⑥ 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1 (Summer 1990), p. 13, Footnote 15.

不同聯盟，以制衡試圖稱霸的國家。誠如英國首相巴麥尊（Henry John Temple, 3rd Viscount Palmerston）的名言，「沒有永久的盟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只有永久的國家利益。」^⑦

（四）適用個案有局限性

米爾斯海默認為，國家必須追求霸權地位才能確保本國安全。但這種推論是建立在歐洲大陸各強國彼此鄰接的歷史背景與地緣戰略基礎之上。傑維斯（Robert Jervis）便指出，在國家林立的歐洲大陸上，安全需求很難得到滿足。^⑧因此，特別是地處歐洲大陸中心的德國或法國，往往都成為了其他國家－甚至是這兩國彼此之間－制衡的目標。但是當視野擴大到全球，或是說將適用個案改為英國或美國時，由於有水域的隔絕性，這些海外大國不用擔心其他歐陸國家的侵略或軍事力量投射，反而出現了不用追求霸權，只要推卸責任給其他國家，自己扮演「離岸制衡者」（off-shore balancer）角色即可的推論。也就是說，在歐洲大陸上，由於各國的鄰近，推卸責任不易成功，各國反倒經常相互制衡，必須要採取攻勢以獲得霸權地位才能確保自身的安全；在全球層面，由於海外大國（英國或美國）離其他大國較遠，但又受到水域的隔絕，無法輕易征服歐洲大陸或被征服，反而可以採取守勢，透過推卸責任讓其他大國相互制衡以收漁翁之利。這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大戰略理論：一種是針對歐亞陸上大國的進攻性理論，另一種是針對海上大國的防禦性現實主義理論。^⑨瓦特基本上認同米爾斯海默的「離岸制衡」觀點，但仍主張應由重要區域（vital areas）的大國承擔維持區域的權力平衡。^⑩事實上，美國得以在全球採取制衡行動，適時介入區域衝突，主要背景就在於歐亞大陸各國相互制衡而非推卸責任。米爾斯海默一方面主張國家必須採取攻勢追求霸權才能獲得安全，另一方面又提出推卸責任的守勢策略。這兩種主張並不能同時適用於海外大國（美國、英國）與其他傳統歐陸大國。

由於米爾斯海默認為，推卸責任是受到威脅的大國要制衡時的主要選擇。基於前述四項概念上的缺陷，在其所提出的案例中，1862~1945年的德國和1861~1943年的義大利反倒出現了以「威脅平衡」觀點能得到更佳解釋的情形。^⑪在德國的案例中，1862~1870年為普魯士建立德意志帝國（Deutsches Reich）時期，擴張範圍僅限於歐洲中部，並未意圖對更廣泛的地區展開侵略。雖然此時期的普魯士是個積極對外擴張的崛起強權，但因為對其他大國來說沒有威脅性，自然不會引發制衡，也沒有要不要推

註⑦ 轉引自：Terry L. Deibel, *Foreign Affairs Strategy: Logic for American Statecraf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28.

註⑧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January 1978), p. 183.

註⑨ Christopher Layne, *The Peace of Illusions: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from 1940 to the Presen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0.

註⑩ Stephen M. Walt, *Taming American Power: The Global Response to U.S. Primacy*, p. 222.

註⑪ 案例可參見：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chs. 6, 8. 筆者並未全盤否認米爾斯海默所提及的其他案例或許較適宜用「推卸責任」的觀點加以解釋。

卸責任的問題。然而，當德國從 20 世紀初期開始，先後兩次引發世界大戰而對歐洲大國確實造成威脅時，其他國家還是選擇了締結聯盟以制衡。^⑦在義大利的案例中，1861~1878 年也是其爭取建立統一的國家期間，但多半是靠普魯士先後打敗奧匈帝國、法國才獲得領土補償。直到 1922 年墨索里尼 (Benito Mussolini) 上臺前，義大利征服的海外領土不但遠少於其他歐洲國家，又多半不具戰略價值，若不是扈從德國，對於其他歐洲大國來說也不具威脅性，此時其他國家既不需要去制衡，又何有推卸責任之慮呢？

伍、再論「制衡」及「扈從」

一、「扈從」概念的歧異

由於學者之間對「扈從」的定義有所歧異，彼此之間產生了爭論，而導致對於國家行為判斷的不同見解。此外，有關「制衡」及「扈從」何者在國際關係中較為盛行的爭論可能並不具有實質意義，因為對於受到聯盟對抗的國家來說，一方面可將對手們的舉動解讀成針對本國的制衡行為，另一方面也可將對方聯盟中的弱小國家視同積極扈從在強國之下尋求安全保護與合作。

在前述有關法國拿破崙的案例中，施韋勒認為這些日爾曼國家是「自願扈從」法國，但懷內克 (Daniel J. Whiteneck) 等人卻認為是「被迫屈從」於霸權的強制作為。布洛爾 (Michael Broers) 針對法國拿破崙戰爭時期的歐洲局勢研究指出，普魯士在 1793 年失去了低地國和萊茵區後，便放棄戰爭。這樣的決定並不是向法國扈從或避免衝突，而是對於正在進行中的戰爭反應。^⑧從普魯士的角度來說，一方面不願向法國靠攏，另一方面則無法尋得有力盟國願意共同制衡法國，而本身實力有限又無法繼續作戰。對於普魯士而言，不可能完全避免捲入法國拿破崙對歐洲的戰事，但如果不設法脫離，將會促使法國以優勢國力征服普魯士。依此看來，普魯士似乎又採取了讓他國來承擔制衡的「推卸責任」。其他學者也指出，固然普魯士在萊茵區的領土出現權力真空，但並沒有證據顯示普魯士與法國站在同一邊或接受附加報酬 (side payments)。當法國軍隊逼近維也納時，又迫使奧國在槍口下接受法國的提議，西班牙與葡萄牙也是如此。^⑨由此可見，懷內克也遵循施韋勒與施洛德的看法，將「扈從」視為自願地靠

註⑦ 依照米爾斯海默的說法，1862~1870 年間英國袖手旁觀的主要考量是讓德意志帝國阻止法國、俄國在歐洲中部的擴張；俄國袖手旁觀的主要考量則是要牽制奧地利與法國，並抑制波蘭的野心，實際上還是基於「制衡」的考慮，差別只在於究竟由何國來制衡。對於 1905 年以後歐洲國家聯盟對抗德國的情形，米爾斯海默認為是互有歧見而不情願的聯盟制衡，參見：Ibid., pp. 159, 292, 297~301.

註⑧ Michael Broers, *Europe Under Napoleon 1799-1815*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6), pp. 13~14.

註⑨ Daniel J. Whiteneck, "Long-term Bandwagoning and Short-term Balancing: The Lessons of Coalition Behaviour from 1792 to 1815," p. 158. 另有學者認為，許多德意志的弱小公國在拿破崙戰爭中採取的是制衡行為。Eric J. Labs, "Do Weak States Bandwagon?" *Security Studies*, Vol. 1, No. 3 (Spring 1992), p. 386.

攏，而質疑普魯士和奧國實際上並沒有靠向法國。換言之，這些學者並不同意瓦特原本將「扈從」視為被迫與威脅來源妥協結盟的觀點，但其彼此之間對於普魯士所採取的策略性質亦未形成共識。

事實上，有時對一國的扈從，實際上只是想要增強己方陣營對另一方威脅者的制衡力量。瓦特後來也表示，許多乍看之下似乎是扈從靠攏的行為，實際上是一種制衡形式，要制衡的威脅是鄰近的國家。^⑤當某國不被視為威脅，還可提供利益時，選擇與該國站在同一邊，就不會是無奈或被迫的決定，而是國家主動的尋求利益分一杯羹，這種情況也是扈從。^⑥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與許多國家建立起聯盟關係，一方面固然可以解讀為係針對蘇聯的制衡行為，另一方面也可說是這些國家主動靠向美國尋求安全保護。因此，在國家之間的聯盟體系中，每個「積極扈從」行為的出現，如果不是形成了尋求安全保護的防禦性聯盟，並隱含著針對第三國制衡的動機，便是試圖透過自願合作而形成攻擊性聯盟，以便在勝利後瓜分成果。在施韋勒將扈從視為主動靠向強權的概念中，亦允許弱勢但試圖改變現狀的胡狼型國家在考慮情勢之後，倒向強大但追求維持現狀的獅子型大國。

由於國家的扈從行為涵蓋了主動追求利益與被迫選擇的兩種動機，實際上可以區分為「積極扈從」與「消極扈從」這兩種不同的行為，或可簡稱為「順從」與「屈從」。「積極扈從」又包含了制衡第三國的防禦性動機，以及瓜分勝利成果的攻擊性企圖兩種可能。若未能一一界定相關案例符合何種類型，吾人並無法直接判斷國際關係中的「制衡」或「扈從」何者較為盛行。

二、「威脅平衡」理論的特性與限制

由於瓦特提出的威脅平衡理論是假設威脅存在時，國家的因應之道。因此，威脅不存在時並「不在其探討範圍」(is not used to test)，而不是其「無法檢驗」(cannot be used to test)。^⑦在瓦特的早期觀念裡，威脅出現後，要不就對抗制衡，要不就妥協扈從，沒有保持中立的空間。因為國家若不對威脅有所因應，威脅就會找上國家。由於威脅已經出現，即便採取的是妥協扈從，也會是在壓力下做出的無奈選擇，因而是被迫的。但另一方面，瓦特又曾指出，當某國不具有威脅性，反倒還能提供利益時，加

註⑤ Stephen M. Walt, *Taming American Power: The Global Response to U.S. Primacy*, pp.187~188.

註⑥ Stephen M.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4 (Spring 1985), pp. 7~8;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p. 21. 瓦特認為，被迫的扈從是基於防禦性的原因，主動扈從則是為了進攻性的因素。由此觀之，瓦特的扈從概念實則涵蓋兩種不同的觀點，只是其特別強調威脅下的扈從，但因對相關詞彙的使用偏離傳統用法，而遭到其他學者的批評。

註⑦ 施韋勒認為，正因為瓦特把制衡與扈從限定在「國家面對威脅」時的反應，因而當不存在重大外部威脅時，瓦特的理論就「無法檢驗」(cannot be used to test) 制衡或扈從的行為。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p. 83, footnote 47. 施韋勒稍後又提到，問題就在於相關的安全議題文獻傾向於過度普遍化了瓦特的發現，而沒有明確指出其理論得以運作的情況，以致於其他學者也運用了這種扈從的概念展開研究。Ibid., p. 84.

入該國陣營就不會是被迫的決定，而是主動尋求合作關係，這種情況也是扈從。⁷⁸持平而論，瓦特所提出的扈從概念實際上涵蓋了積極追求利益與被迫選擇的兩種形式，但其特別關注威脅下的扈從，或可說是將扈從主要視為國家遭遇威脅時的因應策略之一，因而往往是被迫的。瓦特未清楚區別兩種形式的差異而採用同一詞彙來描述不同的扈從行爲，極易造成讀者的混淆。此外，「威脅平衡」理論僅是瓦特所提出有關聯盟起源的可能因素之一，並不是對於國家形成聯盟關係的唯一解釋。當威脅不存在時，國家之間仍可能因意識形態、對外援助或跨國滲透而形成聯盟。

由於米爾斯海默曾表示，在國家設法獲得更大權力的世界裡，幾乎不存在維持現狀大國。不過大國不能總是按照自身的進攻意願而採取行動，因為國家的行爲不但會受到自身需求的影響，還包括實現這些欲望的能力。所有國家都想成爲山中之王，但並非每個國家都有本錢來爭取這個地位，更不用說還能達成目標。一個比對手擁有明顯權力優勢的國家可能更具有侵略性，因為他具備了採取這種行爲的能力和動機。⁷⁹瓦特也曾指出，吾人在檢驗歷史資料時，不僅應該關注國家的行爲，也應該要注意其偏好。⁸⁰從前文施韋勒的觀點推知，當國家面對與本國傾向不同的對手時，不論自己的傾向爲何，勢必會認爲對手的行爲具有威脅性，但本國是否有足夠的能力予以制衡則是另一回事。換言之，部分現實主義學者已開始將國家傾向此一因素納入研究探討的範圍。因此，若吾人將國家面對威脅時採取制衡或扈從的爭議，簡化爲對抗或合作的選擇，以降低解讀上的差異時，即便是僅觀察國家的態度與行爲傾向，也可以將部分現實主義學者的論點加以區分，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國家面對威脅時的行爲類型

		本國的態度	
		主動／自願／積極／參與	被動／被迫／消極／未參與
國家傾向	對抗	現實主義式制衡	推卸責任
	合作	施韋勒式扈從	瓦特式扈從／ 投降 (capitulation) ⁸¹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此外，近來也有學者提出將國家的「能力與意願」或「行爲與傾向」加以區分來探討制衡或扈從的觀點。諸如，根據瓦特探討美國在國際關係中長期享有優勢地位的研究指出，其他較爲弱勢的國家仍會採取不同的反對策略，雖然這些策略未必屬於明顯的制衡行爲，但確實出於抗拒的意圖。若從抗拒的強弱程度加以區分，這些國家的反對策略包括：制衡、妨礙、約束、勒索、去正當性。其中，制衡便可分爲外部與內

註 ⁷⁸ 參見註釋 ⁷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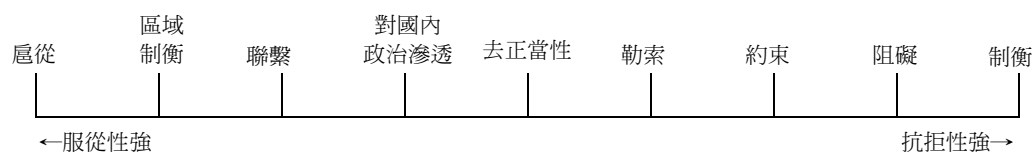
註 ⁷⁹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 37. 粗體字係筆者爲強調所加。

註 ⁸⁰ Stephen M. Walt, "Testing Theories of Alliance Formation: The Case of Southwest Asi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2 (Spring 1988), pp. 282-283. 粗體字係筆者爲強調所加。

註 ⁸¹ 參見：Kevin Sweeney and Paul Fritz, "Jumping on the Bandwagon: An Interest-Based Explanation for Great Power Allianc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6, No. 2 (May 2004), p. 430.

部兩種，外部制衡又涵蓋硬制衡與軟制衡的手段；^②另一方面，即便其他國家願意順應（accommodate）美國的權力優勢，也並不代表會完全服從領導，反而還想試圖影響美國的政策以滿足本國的利益。若從服從的強弱程度加以區分，這些順應的策略包括：扈從、區域制衡、聯繫、對國內政治滲透，^③如下圖 3 所示。換言之，即便其他國家在整體實力上不如美國，但在對抗或合作的意願上，仍然可以保持差異與彈性。其他學者甚至提出了軟制衡與軟扈從的概念。^④

圖 3 弱國對強國權力優勢的因應策略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三、「制衡」的不同方式

由於現實主義學派主要是基於「成本－效益」之理性分析，認為國家往往會採取效益高而成本低的策略。因此，前述瓦特所提出國家可能採取的反對與順應兩種策略實際上不應僅限於弱國對於強國權力優勢的回應，當強國評估這些策略能符合效益時，更可考慮加以採用。根據筆者在上節中對米爾斯海默、瓦特、施韋勒等人論點的彙整，當我們進一步將國家的可動用權力與國家傾向予以細分並同時考慮時，則可將更多學者的論點類型納入，提出較為完整的政策建議。在下表 3 中，當國家傾向對抗而可動用權力遠較對手為多時，政策選擇也會更多，可從較為柔性的軟制衡、推卸責任到強硬的制衡手段來對抗競爭者，或可根據瓦特的分類，採取不同的反對策略，並不限於硬制衡的方式。當國家可動用權力較低而又想對抗競爭者時，就只剩下軟制衡或反對策略的因應方式。^⑤

註 ② Stephen M. Walt, *Taming American Power: The Global Response to U.S. Primacy*, ch. 3. 有關「制衡」的詳細說明，可參見：Ibid., pp. 120-141.

註 ③ Ibid., ch. 4. 「區域制衡」意指尋求美國保護，用以對抗區域威脅。參見：Ibid., p. 187.

註 ④ 參見：Alexandru Grigorescu, "East and Central European countries and the Iraq War: The Choice between 'Soft Balancing' and 'Soft Bandwagoning',"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41, No. 3 (September 2008), pp. 281-299; Birthe Hansen, Peter Toft and Anders Wivel, *Security Strategies and American World Order: Lost Pow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 20-23, 26-37.

註 ⑤ 有關軟制衡（soft balance）的研究，可參見：Robert Pape,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7-45; T. V. Paul, "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46-71;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Wohlforth, "Hard Times for Soft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72-108; Keir Lieber and Gerard Alexander, "Waiting for Balancing: Why the World Is Not Pushing Bac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109-139; Robert Art, Stephen G. Brooks, William Wohlforth, Keir Lieber, and Gerard Alexander, "Correspondence: Striking the Bala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3 (Winter 2005/2006), pp. 177-196.

表 3 國家對外行為政策建議

		國家與對手相比之可動用權力		
		不足	等同	超越
國家傾向	對抗	軟制衡 ←-----→ 推卸責任 軟制衡	←-----→ 硬制衡 推卸責任 軟制衡	
	中立	疏離 (detaching)		
	合作	扈從	姑息 (appeasement)	吸引/接受扈從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此外，還有其他學者特別針對國家處於後冷戰時期美國單極霸權下的可能作為提出了不同的政策建議。賀凱 (Kai He) 等人深入探討軟制衡的概念後，又提出了「制度性制衡」(institutional balancing) 的概念，來指涉國家透過發起、利用和主導多邊制度而非斷然採取軍事對抗的方式，來因應國際關係中的多元壓力或威脅。⁸⁶從國際關係零和賽局 (zero-sum game) 的概念而言，一方之所得，即為另一方之所失。因此，吾人可透過提升自我實力的方式以提升安全，或可減損對手的實力，亦能達到相同的效果。循此邏輯，賀凱後來又將國家可能採取的制衡行為，根據國家感受到的威脅性高低和制衡措施的性質差異加以劃分，將傳統的軍事制衡 (軍事性的積極制衡) 與軟制衡 (非軍事性的消極制衡) 納入，進一步提出了四種不同模式，如下表 4 所示。

表 4 國家的制衡戰略

		國家感受	
		威脅性高：積極制衡	威脅性低：消極制衡
制衡措施	軍事性	內部制衡：軍備競賽、軍事動員 外部制衡：締結聯盟	軍事顛覆、軍售給敵國的敵國 針對敵國的軍備管制
	非軍事性	轉移戰略科技給盟邦 提供戰略經濟援助給盟邦	經濟制裁與禁運、制度牽制 策略性的不合作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可參見：Kai He, "Undermining Adversaries: Unipolarity, Threat Perception, and Negative Balancing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 *Security Studies*, Vol. 21, No. 2 (2012), pp. 166-1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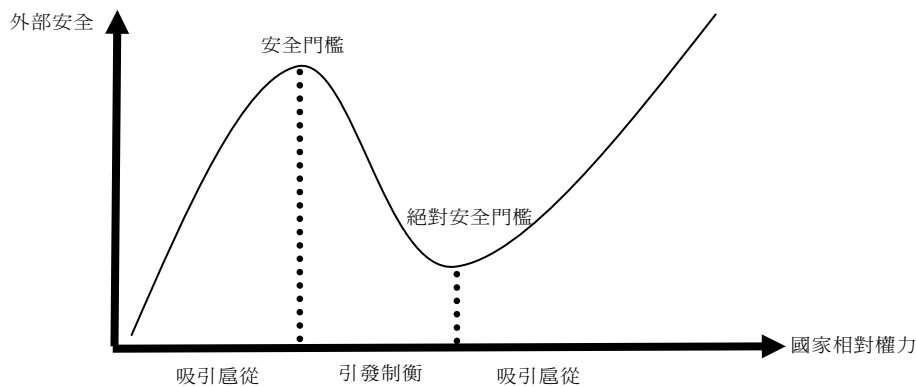
當國家感受到高度威脅時，便可能採取積極制衡，即增強國家相較於對手的權力；當國家感受到的威脅程度較低時，則會採取消極制衡以試圖弱化對手相較於己的權力。賀凱同樣依照「成本－效益」的分析指出，國家在選擇不同的制衡策略時，會特別考量制衡的效用與代價，其不僅要考慮如何以有效而快速的方式來化解外部威脅，還要考慮制衡戰略對於本身安全、經濟與社會影響的代價，而決定採用軍事性或

註 86 Kai He and Huiyun Feng, "If Not Soft Balancing, Then What? Reconsidering Soft Balancing and U.S. Policy Toward China," *Security Studies*, Vol. 17, No. 2 (April 2008), pp. 363-395;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非軍事性的制衡措施。⁸⁷在積極制衡戰略中，由於國家感受到較為明顯的威脅，因而主要是強化本國或己方陣營實力，如此才能以較為迅速有效的方式確保安全。當國家感受到的威脅程度較低時，為減少本國的負擔，便可能考慮採取較為緩和的方式，採取削弱對手或對方陣營實力的消極制衡戰略來實現目標。然而，雖然賀凱簡明扼要地將一般常見的國家制衡行為予以區別，並以國家感受威脅的程度差異作為劃分標準，但當敵國的敵國恰為我方的盟國時，在軍事性的消極制衡中，軍售給敵國的敵國之措施，便會與非軍事性的積極制衡措施混淆。因為軍售本身往往便涵蓋了出售武器裝備與轉移軍事科技的形態，在此情況下，吾人並不易判斷究竟該國是採取了何種制衡措施。⁸⁸

另一方面，華爾滋認為，國家作為單一行為者，在最低程度上尋求維持自身生存，在最高程度上則是宰制全球。⁸⁹對於實力較弱的國家來說，如何防範、避免他國的侵略才是主要生存目標，甚少會積極對外擴張。當國家實力逐漸增長時，有了豐富的資源，才足以支持其他次要目標的實現。菲亞曼吉 (Davide Fiammenghi) 便指出，隨著國家能力增長的階段不同，其所面對的安全外部性會歷經吸引扈從、引發制衡、再度吸引扈從等階段，這種「安全曲線 (security curve)」正好整合了進攻性現實主義、防禦性現實主義、單極現實主義 (unipolar realism) 的觀點。如下圖 4 所示。⁹⁰

圖 4 安全曲線



資料來源：Davide Fiammenghi, "The Security Curve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Neorealist Synthesi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4 (Spring, 2011), p. 137.

註 87 Kai He, "Undermining Adversaries: Unipolarity, Threat Perception, and Negative Balancing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 *Security Studies*, Vol. 21, No. 2 (2012), pp. 154~191, especially pp. 169~170. 在實際運用上，國家往往會混合採用軍事性與非軍事性的制衡措施。

註 88 筆者感謝審查委員所提出的建議。吾人或許可進一步思索修正賀凱所提出的分類標準，因受篇幅限制，本文在此暫不予以深入比較分析。

註 89 Kenneth N. Waltz,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18.

註 90 Davide Fiammenghi, "The Security Curve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Neorealist Synthesi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4 (Spring 2011), pp. 126~154.

換言之，無論國際關係處於單極體系、兩極體系或多極體系下，國家對他國完全的制衡或扈從並不經常出現，反倒存在漸進彈性的作為，而國家會遭遇到的制衡與扈從現象，則要依照本身與其他國家的權力相對增長情況，以及感受到的威脅程度而定。由於當國家與他國的傾向不同時，便會相互視為威脅，極易引發戰爭。但在新現實主義的邏輯下，即便國家傾向相同，由於相互不信任，也不易維持合作關係，不論是欲維持現狀或改變現狀，為了瓜分權力、利益或爭奪主導權，彼此仍有可能會產生衝突。因此，不論個別國家的傾向為何，該國與其他國家之間仍可能相互感受到威脅存在。當我們同時將敵我的個別國家傾向（對抗、中立、合作）與相互權力對比綜合考慮時，即可劃分出國家在國際關係中可能採取的行為模式，但各國仍可能會因傾向改變而在不同模式間遊走。如下表 5 所示。

表 5 國家在國際關係中可能採取的行為模式

對手傾向	對手權力	本國傾向		
		對抗	中立	合作
對抗	強	制衡，但通常需積極扈從其他強權才能成功	閃避或推卸責任 ^①	被迫扈從／姑息／投降
	弱	制衡，可單邊進行或採多邊方式以減輕負擔		單邊或多邊制衡 ^②
中立	強	侵略	X	彼此保持良好互動，避免對手加入敵對陣營
弱				
合作	強	制衡挑釁	閃躲／維持距離，避免捲入衝突	積極扈從
	弱	制衡對抗		接受扈從 ^③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根據表 5 的劃分，國家與他國的互動關係，可表現為：

（一）當本國試圖對抗其他國家時，便需考慮對手的權力大小與行為傾向。1. 若對手也欲對抗反擊，但權力較強時，本國應考慮積極扈從其他強權（締結聯盟）才能成功達成目標；當對手權力較弱時，本國可決定採取單邊（避免盟國溝通羈絆）或多邊聯合其他國家（分攤成本）的方式，獲得最終勝利。2. 若對手欲維持中立時，本國便可忽略雙方實力差距，展開侵略。3. 若對手基於不同考量而希望合作，當該國權力強大時，本國便可考慮是否要制衡挑釁；當該國權力較弱時，本國便可趁機制衡對抗。

（二）當本國試圖維持中立時。1. 他國若表現出對抗傾向，不論其相對權力為何，本國僅能閃避或推卸責任，或在對手一再逼近時，為了確保本國的生存與利益而改變傾向。2. 當本國與他國都欲維持中立，彼此便不會有明顯互動聯繫。3. 若他國積

註 ① 筆者此處所謂「閃避」，即為維持中立而不參與戰事。根據本文前述說明，實際上國家不易完全忽略或閃避威脅，特別是當威脅逐步逼近時，遲早必須改變國家傾向而採取具體行動因應。「推卸責任」表面上是不採取任何作為，但實際上則是設法由其他國家來承擔制衡責任，純粹的推卸責任則不容易成功，最終還是希望制衡出現。

註 ② 當對手造成威脅挑釁時，即便本國原本抱持合作態度，亦可能改採制衡作為，尤其是在對手的可動用權力遠較本國為弱時，通常可以成功制衡。

註 ③ 當弱國願意提供某些利益或服從而被接受合作時，意味著加入較強的陣營而受到保護。

極尋求合作時，則不論該國權力強弱，本國都應考慮是否要維持適當距離而避免捲入不必要的衝突。由前述說明可知，當本國欲維持中立，但遭遇試圖對抗挑釁的國家時，採取閃避只能暫時爭取緩衝時間，並無法完全滿足對手，爲了化解緊張局勢，最後仍會採取不同的因應措施。但當本國欲維持中立，而其他國家試圖爭取合作時，採取閃躲或維持距離的政策，減少受到牽連的可能性，短期內仍得以保障本國的生存與利益，長期而言則或許將視情況而改變傾向。

(三) 當本國表現出合作傾向時。1. 他國若欲加以對抗，而權力較強時，我國在不改變傾向的情況下，只能選擇被迫扈從／姑息／投降；當對手權力較弱但卻敢貿然挑釁時，我國便可考慮採單邊或多邊制衡來制止，但這實際上意味著拋棄原有的傾向。2. 他國若欲維持中立，則不論其權力強弱，我方都可保持良好互動，但仍須提防該國改變傾向而加入敵對陣營。3. 若他國也欲尋求合作時，我方主動靠向實力較強的國家，即爲積極扈從；當他國權力較弱時，則是我方接受了該國的積極扈從。

根據上表 5 內容及文字說明，現實主義學者們的觀點並非完全不相容，只是各自設定在不同的條件背景下產生推論。若吾人一味追求理論的簡約性而忽略了理論應用的前提限制時，反倒會因此削弱了理論的解釋能力。相反地，若欲針對國家在與他國接觸後的可能行爲模式加以解釋或預測時，參考前述各種條件的組合，則可更進一步瞭解其差異之處，如此才能擴展現實主義的解釋能力。這種目的正是連華爾滋本人都極力主張的。⁹⁴

陸、分析與結論

學者瓦特在 1980 年代中期針對聯盟形成的可能因素提出個人見解，並主要聚焦於「威脅平衡」理論，將國家的能力與威脅性加以區分的觀點，對於現實主義的傳統權力平衡觀點提出了修正。縱然同屬現實主義陣營的其他學者曾加以反駁，但本文在對相關論點重新檢視後發現，雖然施韋勒將國家傾向與國家實力加以區分，認爲瓦特對於「扈從」概念的界定偏離了傳統用法，並以法國拿破崙及德國希特勒曾吸引他國扈從爲例，提出國家之間爲了分享利益而積極扈從合作的可能性。但由於施韋勒對法國拿破崙案例的界定與其他學者不同，「扈從」概念又落入弱國被迫向強國妥協的語境。此外，施韋勒片面評斷瓦特的聯盟理論，僅將焦點侷限於「威脅平衡」理論，忽略了瓦特有關聯盟形成的整體理論架構。

另一方面，米爾斯海默主張，當面臨要阻止侵略者的考量時，遭遇威脅的大國實際的選擇是制衡和推卸責任，而只要可能的話，國家偏好推卸責任而不是制衡。但根

註 94 華爾滋曾多次指出，理論的解釋能力而不是其簡約性，才是理論成功的標準。參見：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6, 8; Kenneth N. Walt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1 (Autumn 1996), pp. 56-57; Kenneth N. Waltz, "Evaluating Theori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December 1997), p. 916.

據本文研析的結果，米爾斯海默所指稱的「推卸責任」戰略實際上涵蓋了：被迫扈從、期待責任承擔者出現、本國的內部制衡、責任承擔者的內部制衡等四種不同概念，與其他學者的觀點差異不大。一方面其係將國家採取「威脅平衡」的歷程延展，凸顯正式展開制衡之前的空窗等待期，但實際上又允許國家在必要的時候參與制衡。這樣的論點試圖同時涵蓋不制衡（推卸責任）與制衡，而純粹的推卸責任策略又需依賴其他國家願意承擔制衡任務方能成功，理論本身仍有不足之處。

對於瓦特而言，作為其研究聯盟起源主要核心概念的「威脅平衡」理論是「假設威脅存在」時，國家的因應之道。因此，威脅不存在時並不在該理論的探討範圍。在瓦特的觀念裡，威脅出現後，國家要不就對抗制衡，要不就妥協扈從，沒有保持中立的空間，更不可能依賴其他國家善意承擔制衡的責任而獲得安全保障。由於威脅已經出現，即便採取的是妥協扈從，也會是在壓迫下做出的無奈選擇，因而是被迫的消極扈從。「當威脅不存在」時，國家之間仍會形成聯盟，根據瓦特所提出的理論，此時便可能是受到意識形態、對外援助或跨國滲透的影響，「威脅平衡」理論僅是整體聯盟理論架構當中的一個分支。然而，瓦特一方面未能清楚區分國家被迫選擇與積極追求靠攏大國的差異，都一概視之為「扈從」。另一方面，誠如施韋勒的批評，瓦特忽略了國家之間為了戰略利益而主動合作，或是弱國尋求強國安全保護的積極扈從之可能性，這是其聯盟理論的瑕疵。由於學界對於「扈從」概念在理論發展及個案應用上仍存有歧異，由此觀之，吾人仍應進一步深入探究，並提出其他面向的學術批判。

根據本文的梳理發現，「扈從」的本意是指弱者靠向強者的行為，但實際上橫跨了積極與消極兩種概念。在國際關係中，此概念被施韋勒用於指涉積極扈從，即弱國靠向強國以瓜分利益的順從行為，華爾滋及瓦特等人則是將其界定為弱國被迫選擇靠向強國以求生存的屈從行為。學者們對此概念的詮釋與個案運用並不相同，吾人應加以區別採用，以減少個案適用解讀上的誤判。

由於瓦特後來也表示，許多乍看之下似乎是扈從靠攏的行為，實際上就是針對鄰近國家威脅的制衡。^⑤因此，弱國主動靠向強國的「積極扈從／順從」，如果不是國家之間聯合「制衡」第三國的防禦性作為，便是共同展開侵略以瓜分勝利成果的一種攻擊性聯盟。若吾人僅將弱國與強國合作的現象一概視為「扈從」，便無法清楚區別不同個案在概念上的差異。諸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許多國家加入以美國為首的陣營，這些國家的聯盟行為，一方面可以被解讀為出於制衡蘇聯等共產主義國家的防禦性動機，另一方面也可被視為主動、積極扈從美國以爭取安全保護及經濟利益的表現。

從概念精確性的角度來說，吾人僅能就弱國針對強國的「消極扈從／屈從」與「積極扈從／順從」行為，或「消極扈從／屈從」與「制衡」行為加以比較，來論斷何者在國際關係中較為盛行，或在何種情況下才會出現相應行為，而不應將「消極扈從／屈從」與「積極扈從／順從」的行為一概以「扈從」視之，以免產生混淆。

註⑤ 參見註⑥、註⑦。

筆者初步認為，從學術研究成果來看，學者瓦特不僅提出了「威脅平衡」理論，更進一步探討了有關聯盟形成的理論，且在不排斥其他學派觀點的前提下，綜合運用了不同概念來研究影響聯盟形成與變化的因素，^⑥增強其聯盟理論的解釋能力。雖然瓦特的相關論點較為複雜，國家的威脅感又不易有客觀測定的標準，但其他學者也認為在解釋能力的要求下，簡約性是可以且應該被犧牲的。^⑦然而，由於瓦特對於若干概念並不予以嚴格界定，原先還將扈從定義為「和危險來源結盟」，因而也忽略了弱國積極扈從（順從）強國合作而形成聯盟的可能性，後來才轉而強調聯盟的概念在於對抗外部行為者。相關概念失去一致性與精確性，反倒凸顯出其理論仍有修正空間。

* * *

(收件：2012年12月25日，接受：2013年6月11日)

註^⑥ 另可參見瓦特後來的相關研究成果：Stephen M. Walt, "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 *Survival*, Vol. 39, No. 1 (Spring 1997), pp. 156~179；Stephen M. Walt, "Keeping the World Off-Balance: Self-restraint and U.S. Foreign Policy," pp. 121~154；Stephen M. Walt, *Taming American Power: The Global Response to U.S. Primacy*, especially pp. 19~20.

註^⑦ Sten Rynning and Jens Ringsmose, "Why Are Revisionist States Revisionist? Reviving Classical Realism as an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hang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5, No. 1 (January 2008), p. 29.

An Reappraisal of Walt's Theory of Alliances

Chi-An Chen

Postdoctoral Fellow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Strategic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Abstract

Stephen M. Walt proposed his theory of alliances, focusing mainly on the concept of balance-of-threat. His statement challenged the prevailing concept of balance-of-power theory of traditional realism, thereby receiving criticisms of “balance-of-interest” and “buck-passing.” This article re-examines the debates, and finds out that the major controversy is in fact how to circumscribe “balancing” and “bandwagoning”. When using the concept of “bandwagoning”, scholars take different standing points on its definition and usage both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fact, the concept of “bandwagoning” contains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nnotations. Because of such, the concept turns out to raise unnecessary disputes. According to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Walt's proposition on the theory of alliances contains the statements from other schools, which can strengthen his theory's explanatory power. Nevertheless, in addition to Walt's ambiguous definition on some terms and ideas, his neglect of the possibility that states may form alliances positively for strategic interest, did weaken the accuracy of his theory.

Keywords: balance of power, balance of threat,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uck-passing

參考文獻

中文

- 王元綱，「樂觀的現實主義：國際關係守勢現實主義之評析」，*國際關係學報*，第 18 期（2003 年 12 月），頁 41~57。
- 包宗和，「現實主義之自我論辯及其與批判理論間之解構與建構」，*國際關係學報*，第 18 期（2003 年 12 月），頁 1~21。
- 楊仕樂，「重建威脅理論與台灣大陸政策的案例研究 1993-2005」，*亞太研究通訊*，第 7 期（2009 年），頁 103~128。
- 鄭端耀，「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爭辯之評析」，*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2 期（民國 92 年 4 月），頁 1~21。

英文

- Art, Robert, Stephen Brooks, William Wohlforth, Keir Lieber, and Gerard Alexander, "Correspondence: Striking the Bala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3 (Winter, 2005/2006), pp. 177~196.
- Barnett, Michael N., "Identity and Alliances in the Middle East,"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400~447.
- Bergsmann, Stefan, "The Concept of Military Alliance," in Erich Reiter and Heinz Gärtner, eds., *Small States and Alliances* (New York: Physica-Verlag, 2001), pp. 25~37.
- Broers, Michael, *Europe Under Napoleon 1799-1815*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6).
- Brooks, Stephen G., "Dueling Realism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No. 3 (Summer, 1997), pp. 445~477.
- Brooks, Stephen G., and William Wohlforth, "Hard Times for Soft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72~108.
- Brown, Michael E., Owen R. Cote Jr.,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Offense, Defense and War*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4).
- Deibel, Terry L., *Foreign Affairs Strategy: Logic for American Statecraf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Evera, Stephen Van,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 Fiammenghi, Davide, "The Security Curve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Neorealist Synthesi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4 (Spring 2011), pp. 126~154.
- Gheciu, Alexandra, *NATO in the "New Europe":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after the Cold Wa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Grigorescu, Alexandru, "East and Central European countries and the Iraq War: The Choice between 'Soft Balancing' and 'Soft Bandwagoning',"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41, No. 3 (September 2008), pp. 281~299.
- Hansen, Birthe, Peter Toft and Anders Wivel, *Security Strategies and American World Order: Lost Pow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 He, Kai, "Undermining Adversaries: Unipolarity, Threat Perception, and Negative Balancing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 *Security Studies*, Vol. 21, No. 2 (2012), pp. 154~191.
- He, Kai, and Huiyun Feng, "If Not Soft Balancing, Then What? Reconsidering Soft Balancing and U.S. Policy Toward China," *Security Studies*, Vol. 17, No. 2 (April, 2008), pp. 363~395.
- He, Kai,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 Jebb, Cindy R., *Bridging the Gap: Ethnicity, Legitimacy, and State Align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4).
- Jervis, Robert,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Jan., 1978), pp. 167~214.
- Keohane, Robert O., "Alliances, Threats, and the Use of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3, No. 1 (Summer 1988), pp. 169~176.
- Keohane, Robert 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 Labs, Eric J., "Do Weak States Bandwagon?" *Security Studies*, Vol. 1, No. 3 (Spring 1992), pp. 383~416.
- Lai, Brian and Daniel S. Morey, "Impact of Regime Type on the Influence of U.S. Foreign Ai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October 2006), Vol. 2, Issue 4, pp. 385~404.
- Layne, Christopher, *The Peace of Illusions: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from 1940 to the Presen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 Lebovic, James H., "Unity in Action: Explaining Alignment Behavior in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1, No. 2 (Mar., 2004), pp. 167~189.
- Legro, Jeffrey W.,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Autumn, 1999), pp. 5~55.
- Lieber, Keir, and Gerard Alexander, "Waiting for Balancing: Why the World Is Not Pushing Bac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109~139.
- Mearsheimer, John J.,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1. (Summer, 1990), pp. 5~56.
- Mearsheimer, John J., and Stephen M. Walt, *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7).
- Mearsheimer, John J.,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 Miglietta, John P., *American Alliance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1945-1992: Iran, Israel, and Saudi Arabia*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2).
- Miller, Paul D., "Five Pillars of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Survival*, Vol. 54, No. 5 (October-November, 2012), pp. 7~44.
- Pape, Robert,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7~45.
- Paul, T.V., "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46~71.
- Ripsman, Norrin M., and Jack S. Levy, "Wishful Thinking or Buying Time? The Logic of British Appeasement in the 1930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3, No. 2 (Fall 2008), pp. 148~181.
- Russett, Bruce M., "An Empirical Typology of International Military Alliances,"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5, No. 2 (May, 1971), pp. 262~289.
- Rynning, Sten and Jens Ringsmose, "Why Are Revisionist States Revisionist? Reviving Classical Realism as an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hang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5, No. 1 (Jan 2008), pp. 19~39.
- Schroeder, Paul,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Oxford: Clarendon, 1994).
- Schweller, Randall L.,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p. 72~107.
- Schweller, Randall L.,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3 (Spring 1996), pp. 90~121.
- Schweller, Randall L., "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2 (Fall 2004), pp. 159~201.
- Snyder, Glenn H.,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4, No.1 (Spring 1990), pp. 103~123.
- Sweeney, Kevin, and Paul Fritz, "Jumping on the Bandwagon: An Interest-Based Explanation for Great Power Allianc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6, No. 2 (May 2004), pp. 428~449.
- Uslu, Nasuh, *The Turkish-American Relationship between 1947 and 2003: The History of a Distinctive Alliance* (New York: Nova Science, 2003).
- Walt, Stephen M.,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4 (Spring, 1985), pp. 3~43.
- Walt, Stephen M., "Alliances in a Unipolar World,"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Jan. 2009), pp. 86~120.
- Walt, Stephen M., "Collective Security and Revolutionary Change: Promoting Peace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 George W. Downs, ed., *Collective Security beyond the Cold*

- War*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pp. 169~195.
- Walt, Stephen M., "Keeping the World Off-Balance: Self-restraint and U.S. Foreign Policy," in G. 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21~154.
- Walt, Stephen M., "Testing Theories of Alliance Formation: The Case of Southwest Asi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2 (Spring, 1988), pp. 275~316.
- Walt, Stephen M., "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 *Survival*, Vol. 39, No. 1 (Spring 1997), pp. 156~179.
- Walt, Stephen M., *Taming American Power: The Global Response to U.S. Primacy* (New York: Norton, 2005).
- Walt, Stephen M.,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87).
- Waltz, Kenneth N., "Evaluating Theori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Dec., 1997), pp. 913~917.
- Waltz, Kenneth 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1 (Autumn 1996), pp. 54~57.
- Waltz, Kenneth 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 Co., 1979).
- Wendt, Alexander,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Spring 1992), pp. 391~425.
- Wendt, Alexander,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Whiteneck, Daniel J., "Long-term Bandwagoning and Short-term Balancing: The Lessons of Coalition Behaviour from 1792 to 1815,"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No. 2 (2001), pp. 151~168.
- Wither, James, "An Endangered Partnership: The Anglo-American Defence Relationship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European Security*, Vol. 15, No. 1 (March 2006), pp. 47~65.

網站資料

- "The Role of Foreign Aid in Development," 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http://www.cbo.gov/ftpdocs/0xx/doc8/foraid.pdf>>. 瀏覽日期：2013年3月20日。